

■ 刘亮 徐晓帆

今天中国人在谈论古典文学时，往往会在唐诗、宋词、元曲的后面加上“明清小说”。而明清小说之所以能够进入中国文学经典的殿堂，与“四大名著”——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的巨大影响力显然是分不开的。1952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古典名著《水浒传》，拉开了“四大名著”的出版序幕。这四部小说作品不仅被国内外众多出版社一版再版，更以影视化的形式得到了多角度多方位的创新性呈现。如央视86版《西游记》，已经成为中国少年儿童每个寒暑假必看的文艺大餐。

如今，70年过去了，时代奔涌向前，经典仍旧熠熠生辉。然而，尽管“四大名著”在中国家喻户晓，但“四大名著”之说从何而来，其刊刻流传过程中的嬗变过程，却仍需我们探其渊薮。

# 国民读物如何形成的？

从“四大奇书”到“四大名著”

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前，“四大名著”之说尚未出现。较早出现的近似说法是“四大奇书”。据清初著名文艺评论家李渔在《醉翁亭》本《四大奇书第一种》(《三国演义》)卷首序言所说，明代的王世贞曾提出“宇宙四大奇书”的说法。但王世贞所说的四种奇书中只有《水浒传》是小说，其他三部《史记》《南华》《西厢》是经史与戏曲。相比之下，明末小说家冯梦龙提出的“四大奇书”，除《金瓶梅》外，其他三种与“四大名著”已经完全一致。由此可见，到冯梦龙这里，由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与《金瓶梅》构成的“四大奇书”之说已经基本定型。

当然，在“四大奇书”流传的过程中，社会风向、文化性格、审美趋势等的不同都会对此“四大”作品的选择接受有所影响，其中受到冲击最大的当数《三国演义》。如乾隆年间的张书绅就认为应该由《封神演义》替代其位置才对。而在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面世后，《三国演义》的地位受到了更严峻的挑战。鲁迅先生就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说：“明季以来，世目《三国》《水浒》《西游》《金瓶梅》为四大奇书，居说部上首，比清乾隆中，《红楼梦》盛行，遂夺《三国》之席，而尤见称于文人。”可见清代中叶以后，《三国演义》在“四大奇书”中的位置已经逐渐被《红楼梦》所取代。

到了二十世纪初，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，由于《金瓶梅》一书中色情描写居多，受到了胡适等人的排斥，其地位显著下降。1920年，亚东图书馆陆续出版了标点本的《水浒传》《儒林外史》《红楼梦》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等明清章回小说16种，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。到了1950年代，人民文学出版社以“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”的名义出版了包括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红楼梦》《西游记》在内的系列小说点校本，而印量最大的就是这四种，从而在出版发行层面为“四大名著”之说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。

1981年出版的郑国钦等编著的《文学理论》一书中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“四大名著”的说法。自此之后，“四大名著”之说逐渐成为文化圈与百姓阶层的普遍共识。

“四大名著”的版本情况

“四大名著”作为中国古典小说中影响最大的四种，在流传的过程中产生了众多的版本。如版本情况最复杂的《水浒传》一书，已知的版本超过130种。早期的《水浒传》分为“繁本”和“简本”两个系统。繁本系统又分为三个主要版本，按照出现时间的先后，分别为百回本、百二十回本和七十回本。其中七十回本是由明末文人金圣叹假托古本删削而成的，全称为《金圣叹批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》。简本系统的各种版本则流传不广。

《三国演义》的各种版本依照产生时间的先后顺序可分为“通俗演义版本类”“志传版本类”“批评版本类”及“毛氏版本类”等四大类。其中毛氏版本类主要是指清康熙年间的毛纶、毛宗岗父子修订而成的《三国志演义第一才子书》。现存的《西游记》小说明清版本共12种。其中包括明代刊本4种，明版简本2种，清刻本6种。《红楼梦》的版本有两大系统，即八十回本的“脂评”本系统和一百二十回本的程高本系统。国内外现存早期抄本12部，抄本上有脂砚斋和畸笏叟的批语，一般题为《石头记》。一百二十回本是程伟元排印的印刷本，具体又可分为程甲本、程乙本、程丙本。程高本后四十回并不是曹雪芹的原著，而是由高鹗续作而成。由于形式上较为完整，程高本成为后世最通行的本子。

从1952年10月至1954年6月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红楼梦》和《西游记》的点校本。其中《水浒传》以金圣叹批改的七十回本为底本；《三国演义》以毛纶、毛宗岗父子评点本为底本；《红楼梦》以程乙本为底本；《西游记》以明代世德堂本为底本。如果从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早出版的《水浒传》算起，今年恰是70周年。1990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精装16开彩色插图本“四大名著”。后来长征出版社又出版过《漫画四大名著》，海天出版社也出版过《中国古典四大名著》，其他大大小小各类型出版社以“四大名著”名义出版的丛书与研究论著更是数不胜数。这些共同推动“四大名著”成为中国人的国民读物。

“四大名著”尽管有很高的知名度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“四大名著”与海南还有着一段美妙的因缘。

《水浒传》中梁山泊一百单八将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，那么水浒英雄中有没有海南籍的好汉呢？还真的有，而且不止一个，《水浒传》一百零八条好汉中的“病尉迟”孙立与“小尉迟”孙新兄弟，实际上就是琼州人士。如果再算上孙立的妻子铁叫子乐和、孙新的妻子母大虫顾大嫂以及表弟“两头蛇”解珍、“双尾蝎”解宝，天罡地煞中与琼州有关联的好汉竟多达六位。

原来，百回本《水浒传》中孙新出场时，书中介绍“原来这孙新祖是琼州人氏，军官子孙，因调来登州驻扎，弟兄就此为家”。据书中所说，孙氏兄弟的祖父是琼州人氏。根据《万历绍兴府志》的记载，唐太宗贞观五年（631）始置琼州。北宋宋宗熙宁年间，朝廷在琼州设琼管安抚司，隶属广南路，统辖整个海南地区。孙氏兄弟的祖父本籍琼州，所以兄弟二人毫无疑问可以被称作海南人。

而另外两部名著——《西游记》和《红楼梦》，书中虽然并未有直写海南的文字，但在1980年代央视拍摄同名电视剧时，却都将海南作为重要的取景拍摄地之一。如杨洁导演在拍摄86版《西游记》过程中，曾率领摄制组来到文昌，拍摄了猴王出世后觅食及爬上椰树的镜头。另外，《祸起观音院》中的部分片段及12集之后每集片尾中师徒四人牵着马穿行在椰林水边的镜头，也都拍摄于海南文昌。央视87版《红楼梦》片头中的荒山巨石，据说其远景镜头是取自于“海南第一山”——东山岭。当年王扶林导演因为黄山“飞来石”只适合拍近景，不宜拍远景，于是决定另外拍摄一处远景与近景相结合。最终，剧组选择了海南东山岭上的一块石头作为远景拍摄对象，从而成就了87版《红楼梦》片头中通灵顽石的经典片段。

（作者简介：刘亮，文学博士，绍兴文理学院教授；徐晓帆，绍兴文理学院硕士研究生）

## 青玉大禹治水图山子

大玉上才相称。现在玉山已制成，自从采玉开始，十年之久，耗费许多人力物力。乾隆还告诫子孙，如果仅仅为了追求珍玩，今后绝不允许再做这样的事。从诗中也可知道制造玉山的本末和目的。

据前人记述，从新疆运大玉到北京需要制作轴长三丈五尺的特大专车。车上有铜把，前用一百多匹马拉车，后用千名夫役扶把推运。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，冬季则泼水结冰路面拽运，日行五至六里。据此计算自和阗至北京一万一千一百里，需时三年才能运到。

玉料运到北京以后，乾隆皇帝选用《石渠宝笈》著录的《宋人画大禹治水图》轴为稿本，将原图发交内务府大臣舒文，命贾铨照图式样在玉上临刻。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）二月二十七日，拨得玉山蜡样及画得正背左右画样四张。同年五月七日，乾隆批准蜡样和画样，经过运河把大玉载往扬州，交两淮盐政图明阿

选玉匠照样制造。后来因恐蜡样久熔化，又照样刻成木样。

自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在扬州开工，到乾隆五十二年（1787）六月完成，琢制用工达10万人次。同年玉山再经运河运到北京。九月间安设在宁寿宫乐寿堂。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，命造办处如意馆的刻玉匠把御诗刻在玉山的背面。

“青玉大禹治水图山子”的制成，在玉器工艺美术史上是一次伟大的创举，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才能与智慧。

（图文经授权摘自《故宫国宝100件》一书，有删改。）

清·乾隆五十二年（1787）  
高224厘米，宽96厘米，座高60厘米，重约5330千克

## 王佐诗中的攀丹唐氏

■ 陈有济

海口府城攀丹村是海南文化名村。攀丹村获此殊荣，与攀丹氏的科举成绩有密切关系。攀丹氏自南宋末年始祖唐震渡海迁琼，七百多年间，英才辈出，仅明一代就出了6位进士，其中还有两对父子进士，令人称绝。至于明清两代族中的举人贡生，更是为数众多。攀丹唐氏这一海南本土的科甲望族，被人称赞：“海外无双唐氏，天南第一攀丹。”

明代海南著名诗人王佐，与攀丹氏有渊源关系。王佐的母亲唐朝选，是攀丹氏第七代子孙唐瑶的女儿。王佐幼年曾在攀丹村读书，拜攀丹氏第一位进士唐舟为师。由于母亲的关系，王佐与攀丹氏家族过从甚密，我们从王佐《鸡肋集》中就能找到王佐为攀丹氏的唐胄、唐正、唐廉、唐纲、唐继祖等人写的一些诗篇。

《贺唐举人平侯》为王佐写给唐胄的一首赠诗。明弘治十一年（1498），唐胄应乡试中礼魁、亚元，王佐作此诗相赠。唐胄，攀丹氏第九代子孙，弘治十五年（1502）进士，历任左布政使、巡抚等多个职位，晚年官至户部左侍郎，有正德《琼台志》《传芳集》等著作传世。唐胄在《明史》中有传，传文称唐胄“耿介、孝友、好学、多著述。立朝有执持，为岭南人士之魁”。王佐在诗中祝贺唐胄中举，夸赞唐胄有大才，甚至比肩古代的文学大家，“遇子苏则然，知子欧所愧”。

《柬唐榕冈处士尚义二首》是王佐为唐胄的父亲唐正写的两首诗。唐正读书很多，嗜好吟诗，但淡泊名利，未曾参加科考。唐正曾在自家屋子附近的小山岗种植一片榕树，平时在榕树下悠游，因而有“榕冈处士”的称号，他的诗集便取名《榕冈集》。王佐第一首诗，称赞唐正的家族是书香门第，“榕树公家有后昆，故家文献百年存”；劝说唐正，“如今子好万事足，但可怡情日弄孙”。第二首则祝愿唐正高寿，“白头林下胜登瀛”。

《寄表侄唐濂伯必周》《唐必周解元墓》二诗与唐濂伯有关。唐濂伯，攀丹氏第十代子孙，按辈分属王佐的表侄。唐濂伯是著名的才子，相传有过目不忘的本领，明景泰四年（1453）考中广东乡试解元，时年仅十八岁，可惜天不假年，未及参加会试而卒。第一首为王佐与唐濂伯分别后写给对方的诗，在诗中劝勉唐濂伯发奋读书，“不为功名为祖生”。第二首是王佐悼唁唐濂伯的诗，诗句“他时若问田边墓，五岭南来第一人”，充满了惋惜之情。

《别唐必大》是王佐与唐纲分别时写的一首赠诗。唐纲，攀丹氏第八代子孙，曾任广西梧州府怀集县（今广东怀集县）训导。在外当官已经十年没回过家乡的王佐，对家乡很是怀念，见到唐纲非常高兴，并期待“明发分襟还有待，九霄云路看飞扬”。

《武昌送唐善继之长沙卫经历》为王佐在武昌给赴任长沙卫的唐继祖写的送别诗。唐继祖，攀丹氏第九代子孙。唐继祖的祖父即名列攀丹氏第一位进士、明代海南第三位进士的唐舟。王佐在诗中说长沙是个好地方，“若问长沙风景色，江城吹角水漫漫”，劝勉唐善继安心赴任。

除了诗，《鸡肋集》里还有王佐代母亲为唐濂伯写的一篇祭文《代母祭表侄唐濂伯解元》，以及王佐受唐继祖之托为唐继祖的妻子冯银写的《冯氏墓志》。冯银是明代海南有名的女诗人，明末陈是集编的《溟南诗选·闺媛诗》收录了她的诗五言绝三首和七言绝一首。王佐《冯氏墓志》成为后人了解冯银基本事迹不可多得的文献。

文  
史  
考

